

关于《宣和印谱》的再思考

朱金国

内容提要：宋代印谱是宋代金石古器物学的产物，并随着金石学的兴起而发展；但有着敕撰色彩的《宣和印谱》，自明清以来一直争讼不断，或被认为是空穴来风，这对于印谱史研究来说是极遗憾的事。对《宣和印谱》的研究，除了从印谱本身及历来文献记载外，不能忽视与其有关的宣和殿的作用（因为宣和殿是宋代最重要的金石古器物收藏与研究、宣和丛书编撰的地方）；也不能忽略宋代官家对于玺印图谱的编辑（因为宋代官家玺印图谱的编辑，或影响了宋代文人篆刻集古印谱的形成）。因此，本文对于《宣和印谱》的再思考，并不专注于单一的印谱考证，而是从这两方面入手，结合多方面因素以还原历史真相。同时对相关文献（如印谱的创始者《印格》的序跋）作进一步真相的解读，希望为深入研究宋代印谱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金石玺印图谱 宣和 宣和殿谱 图书谱

一、宋代金石学与玺印图谱

北宋是一个有着显著特色的社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促进并带动了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1]自宋仁宗“仁宗盛治”后，仁宗本人对于古器物的重视，起到了“上之化下，下必从焉”^[2]的表率效应。宋代金石学发展到哲宗、徽宗时代，已成为显学。^[3]

（一）金石学、玺印图谱与印谱

宋代金石学的产生和发展并成为显学的过程，也为小众的宋代文人篆刻及印谱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中玺印图谱的编辑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郑文宝编辑《传国玺谱》^[4]，到宋仁宗皇祐初曾命太常摹

[1]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2] 史正浩：《宋代金石图谱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宋太宗至道三年（997），郑文宝根据前人的玺谱编纂成《传国玺谱》，书中收录了历代传国玺图样，是宋代第一部古器物图谱和第一部玺谱。

[3] 《全宋笔记》第三编（九），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223页。

[4] 史正浩：《宋代金石图谱研究》，第68页。

历代印书为图^[1]，再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制《御府宝图》^[2]，这一过程既是宋代金石活动过程，也是宋代篆刻艺术和印玺谱系的成长过程。

其次，金石古器物研究丰富了印谱编辑方法，“宋人治此学（金石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3]。搜集、著录、考订、应用为印谱产生的前提，也为印谱编辑的进步提供了基础。“然宋人搜集古器之风，实自私家开之”，“又观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实用刘敞《先秦古器图》、李公麟《考古图》体例，则徽宗之大搜古器，受私家藏器之影响不少也。”^[4]私人的收藏、著录与编辑也影响着官家的收藏、著录与编辑。反过来官家的收藏、著录与编辑也影响着私人（士人）的行为。

“宋人于金石学不徒以搜集为能事，其最有功于此学者，则流通是也，流通之法分为传拓与著录二种。”^[5]而传拓与著录是印谱编辑的重要手段与目的，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无不影响着宋代篆刻艺术的发展，与千年后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西泠印社宗旨有相似之处。

因此，宋代金石学活动，即古器物的收藏及资料汇集、图籍编辑（包括玺印图谱的早期编辑），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宋代文人参与的篆刻活动及集古印谱的编辑形式。也可参看陈振濂先生《关于印谱的创始者》一文的有关内容。

（二）宣和殿收藏及文艺活动

宋代金石学发展至北宋哲宗、徽宗时期，作为金石学收藏研究中心的宣和殿横空出世。宣和殿收藏和文艺活动，不但编辑了《宣和睿览集》《宣和殿博古图》等金石著作，也为后来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牌谱》丛书的编辑提供了保证，影响了文人篆刻的发展进程。

1. 宋乔年、米芾（1051—1107）相继主持过宣和殿（书画所）^[6]收藏、著录等有关工作。文人艺术家参与宣和殿收藏的整理与著录活动，不但提升了金石研究的进程，同时也影响了篆刻艺术与文人印的发展（如：米芾用印、宋徽宗收藏等用玺）。

2. 宋徽宗的独特爱好与行为，使得宋徽宗时期的文艺发展一枝独秀，宣和殿的收藏、研究尤为突出。宋徽宗一些重要作品都留有宣和殿的痕迹，如：《蜡梅山禽》（图1）、《芙蓉锦鸡图》（图2）有“宣和殿御制”款；《闰中秋月诗帖》（图3）、《书牡丹诗帖》（图4）有“宣和殿宝”款。可见“宣和殿”在宋徽宗心中的地位。

3. 宣和殿收藏金石古器之盛况，“大观初，乃效公麟《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尝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两廊，召百官而宣示焉，当是时天子尚留心政治，储神穆清，因从琐闼密窥，听臣寮访诸左右，知其为谁，乐其博识，喜于人物，而百官弗觉也。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

[1] （清）吴騫：《续古印式》序。

[2] 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

[3]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第113页。

[4]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第114页。

[5]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第115页。

[6] 《全宋笔记》第三编（九），第220页。



图1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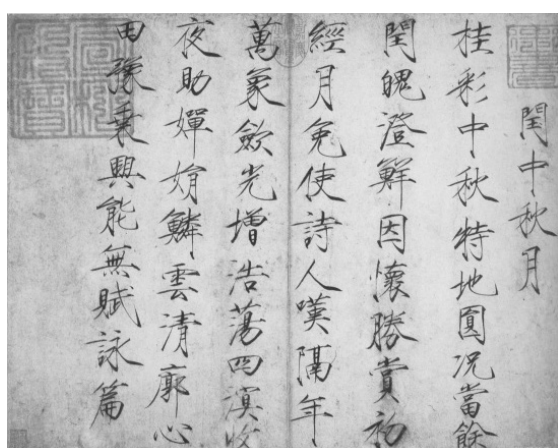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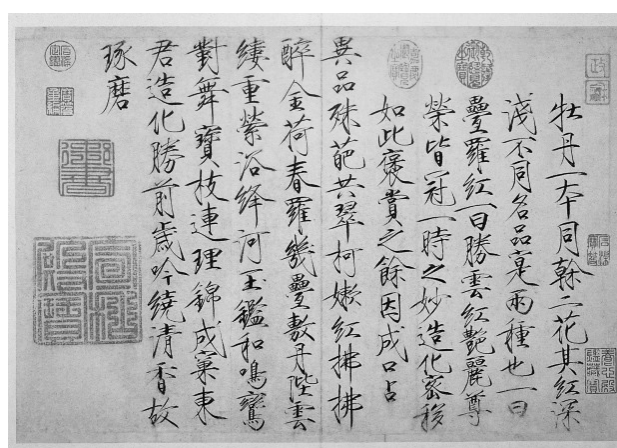


图4

物，非特殊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至万余。”^[1]“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至于图录规模，则班班尚在，期流传以不朽云尔。”^[2]“吾以宣和岁癸卯，尝得见其目。”^[3]蔡條《铁围山丛谈》不但记录了大观初年宣和殿的收藏盛况，还记载了宣和殿中古器物的编辑、著录。不但看到书谱、画谱、古器物的书目著录，而且明确古玺、鼎彝、书画几大类别记载书目。宣和殿所贮古玉、印玺为集古印谱的编辑提供了条件。

二、《宣和印谱》的文献记载与相关研究

（一）文献记载

元明以来对有敕撰色彩的《宣和印谱》记载极多，郁重今先生辑编的《历代印谱序跋汇编》，收入有关“宣和”的印谱五十余条（详见附录一）；韩天衡先生编订的《历代印学论文选》，所收入涉及《宣和印谱》者有十一条（详见附录二）。这些记载似乎都是肯定印谱始自《宣和印谱》的，归纳起来有三种叫法：《宣和谱》《宣和殿谱》《宣和印谱》。但这些文献在提及《印谱》时并没有去考证或提供相关证据，所以也难以肯定印谱是在“宣和殿”或“宣和年间”编辑，或是采用折中的方法。虽然《宣和谱》《宣和殿谱》《宣和印谱》等指向并未一致，但历来人们所引用普遍定位于《宣和印谱》是敕撰编辑，即宣和年间敕撰宣和丛书之一。

（二）影响与相关研究

1. 《宣和印谱》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明清印学文献的引用上占有重要比例，而且还体现在现代的众多印学论著上，虽然作者或许对其持否定观点。如：韩天衡先生主编的《中国印学年表》^[4]“北宋1125年条，在此期间，官府辑成《宣和印谱》”。《中国篆刻大辞典》^[5]“古玺印谱录，传为宋徽宗赵佶时内府所辑，四卷”。《九百年印谱史考略》^[6]“印谱的起始，历来以《宣和印谱》为权舆”。“由杨克一首创汇印成谱，继之又有‘上之所好’，敕撰《宣和印谱》，开始了汇辑印谱的风气。”《印谱九百年说》^[7]一文“谈到印谱，历来都讲，印谱之祖是《宣和印谱》”。

2. 既否定其为印谱之始，又否定印谱的存在，以韩天衡先生为代表。韩天衡先生解释为“在印谱史上造成始自《宣和印谱》的讹谈，与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观念不无关系，因同是出现于北宋

[1] 《全宋笔记》第三编（九），第222页。

[2] 《全宋笔记》第三编（九），第223页。

[3] 《全宋笔记》第三编（九），第220页。

[4] 韩天衡编著：《中国印学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5] 韩天衡主编：《中国篆刻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6] 韩天衡：《九百年印谱史考略》，西泠印社编：《“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

[7] 韩天衡：《印谱九百年说》，西泠印社编：《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第663页。

的印谱,《宣和印谱》是敕撰,杨克一《印格》为私辑,在次序上必然会出现这种合法的颠倒”^[1]。

3. 否定其为印谱之始,但未否定印谱的存在,以陈振濂先生为代表。如陈振濂先生所著的《篆刻艺术学通论》述史一节^[2]:“《宣和印谱》被认为是相当早的一部印谱,这是篆刻界普遍公认的。”“由于《宣和印谱》是皇家编纂而成,又起于较早,因此人们对之比较重视,历来谈印谱者无不引为首要。”“肯定了《宣和印谱》的曾经存在,对于印谱研究是很有收益的。”

4. 既未否定其为印谱之始,又未否定印谱的存在,以朱关田先生为代表。延续《宣和印谱》为宣和丛书之一,如朱关田先生著《印谱起源小识》,其中还提出《印格》(图书谱)具有学术性的观点。

以上研究成果中,陈振濂先生的观点显得最为合理和辩证,且有理有据。陈振濂先生早在1981年撰写的《关于印谱的创始者》,发表于1983年12月《西泠艺丛》第八期,以及发表于1985年第十三期上的《啸堂集古录-考》,这两篇论文,一是首次提出宋代“私家编”与“官家编”印谱的概念,这种定位宋代印谱的存在方式和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一文对于宋代金石学的编辑分类方式相吻合。二是从杨克一身份研究上明确宋代文人参与篆刻,并总结篆刻经验之举,这是印学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三是明确了私家编辑的《印格》(图书谱)为印谱的创始者。四是纠正了历来对于《印格》(图书谱)编者杨克一、《啸堂集古录》编者王俅的错误记载。种种这些成果,不但开宋代篆刻史研究的先河,也为宋代篆刻研究乃至印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证据。

(三) 对《宣和印谱》的质疑

对敕撰《宣和印谱》持否定的观点,不利于印谱史研究,尤其不利于宋代篆刻史的研究。笔者认为有讼必须要解决,或尽可能地减少分歧,达成一致。对《宣和印谱》质疑来源于:一是文献记载,《宣和印谱》最早出现在元代吾丘衍著的《学古编》,但只见明代罗浮山樵刻本。二是明代晚期来行学的《宣和集古印史》自序,证据不可考,或被证实有作伪倾向,已被大家所诟病和否定。三是清初《四库全书提要》“关于宣和印史”质疑。四是元以前文献书目记录等。其中以《宣和集古印史》毛病最大,以《四库全书提要》质疑影响最广。

1. 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

来行学编辑的《宣和集古印史》(1596年),其自序曰:“耕于石簪山畔者,桐棺裂,获丹筒一函,内蜀锦重封《宣和印史》一卷,凡载官印千二百有奇,私印四千三百有奇,旁皆音释文字。”“考印之有谱,自宋宣和殿始,宣和谱不传。而后王顺伯、王子弁、晁(杨)克一、赵文敏、吾子行、杨宗道、钱舜举、吴孟思、沈润卿、郎叔宝、顾汝修各为之谱,识者不无罔象遗珠之叹,此谱盖南渡以来好事家所宝以自殉者,岂六陵既入会稽神物,随以去来耶。”^[3]自序中《宣和印史》一卷有横空出世之举,且理由难以自圆其说。

《宣和集古印史官印凡例》:“孔壁既开,汲冢复睹。自宣和谱印以后,诸名家编次虽繁,然而荆营瓦砾之下,残阙颇存;赏鉴博洽之流,收摹益富。人握蛇珠,家珍和玉。凡集印:首收藏,

[1] 韩天衡:《九百年印谱史考略》,西泠印社编:《“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第488页。

[2] 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第188—190页。

[3] 《宣和集古印史》宝印斋藏版徐安刊本。

次临拓，次宣和谱，泊（洎）集古、学古、印史、印藪诸书。”^[1]

虽然对于来氏印谱的质疑，观点较为一致，本文则关注其自序中几个信息，一“《宣和印史》一卷”载有官印1200枚，私印4300枚；二“考印之有谱自宣和殿始。”

2. 《四库全书提要》

“此书^[2]则自宋以来诸家书目所不载，惟吾丘衍《学古编》末有隆庆二年（1568）罗浮山樵附录五条，其世存古今图印谱式条内，载有《宣和印谱》四卷，计其年月，适在此书初出之时，然则即据此本以载入，非古有是书矣，况桐棺易朽，何以南宋至明犹存，其为依托，显然明白。”^[3]提要观点主要针对来氏自序中《宣和印史》一卷之来历；桐棺易朽，何以南宋至明犹存。进一步指明“来氏《宣和印史》一卷是伪托罗浮山樵刻本中《宣和印谱》四卷”。四库提要作为质疑的代表，其影响巨大、深远。

3. 文献、书目及印章数量

《宣和印谱》佚失，至今未见。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元《宋史·艺文志》等重要公私书目均未记载。

韩天衡先生根据明来行学自序记载“凡载官印千二百有奇”与清初徐贞木《观妙斋集印》序记载“余官印五百有奇”，二说多抵牾。^[4]从收入印章的数量上提出了质疑。

以上众因素形成《宣和印谱》至今聚讼不断，质疑不绝。

三、宣和、宣和殿与宣和丛书

由于宋代文化学术与科技的进步，以至佳纸、名墨辈出，配以优秀的刻印工艺，成就了精彩的宋版书籍，使宋版书籍成为名贵珍稀的代表，以至后世藏书界出现“佞宋”的现象。人们对于“宣和”的称谓明显有“佞宋”的倾向，但宋代“宣和”一词并非宋徽宗宣和年间特定概念。以特定概念来定位《宣和印谱》，这是历来人们产生误解的根源。明确“宣和”在宋代的定位是对《宣和印谱》再思考的一个关键点。龙乐恒《宋有〈宣和印谱〉质疑再探》一文也注意到这一现象。^[5]

（一）宋之“宣和”

1. 宣和殿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等记载，宣和殿为北宋皇宫建筑之一，是禁中皇室一重要的藏书处所。宣和殿不但藏书，还藏有大量历代名画、书法真迹、古代器物等。前后经历始建、毁拆、复建、重修等过程。宣和殿初建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四月。元符三年（1100），徽宗赵佶立，向

[1] 《宣和集古印史》宝印斋藏版徐安刊本。

[2] 《宣和印史》一卷。

[3] 《四库全书提要》子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21—1522页。

[4] 韩天衡：《九百年印谱史考略》，西泠印社编：《“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第487页。

[5] [法]龙乐恒：《宋有〈宣和印谱〉质疑再探》，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1998年版，第4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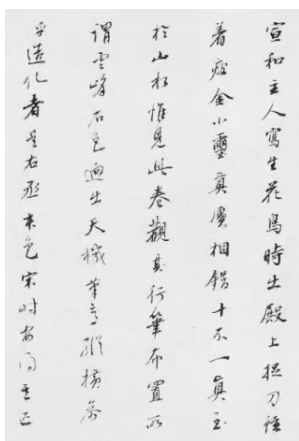


图5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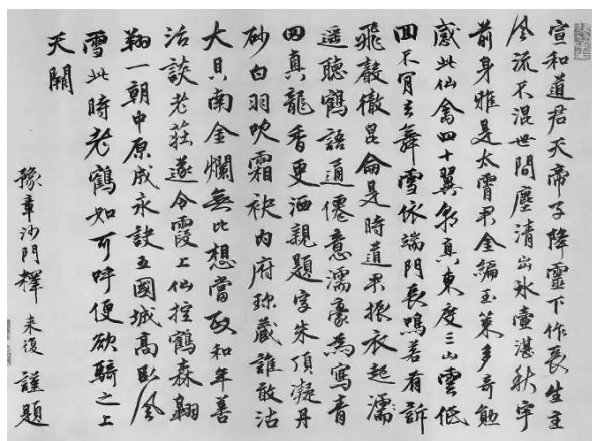


图7

太后垂帘听政，宣和殿被毁拆。徽宗亲政以后，复建宣和殿，并作为自己的燕息之处。大观二年（1108），对宣和殿重加修缮，徽宗亲书为之记并刻诸石。重和元年（1118），改明年（1119）年号为宣和，因犯年号，改宣和殿为保和殿。宣和四年（1122），诏建局对三馆图书“以补完校正文籍名，设官综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1]。

2. 宣和年间

宣和为北宋徽宗第六个年号，自1119年至1125年。^[2]

3. 宣和主人

宋徽宗赵佶自号宣和主人^[3]。也见明董其昌、王世贞有跋（图5—6）。另有称“宣和道君”（图7）。

（二）宣和丛书

宣和丛书目前也是约定俗成的称谓，即宋宣和年间奉敕撰编辑之书籍，共有《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牌谱》等，另外认为还有《宣和玉谱》《宣和琴谱》《宣和砚谱》《宣和茶谱》《宣和印谱》。本文只是选取有关信息进行分析，从中查找线索作为本文思考的佐证。

1. 《宣和博古图》

王国维先生《宋代之金石学》一文，认为“蔡絛《铁围山丛谈》所记载徽宗一朝搜集古器事，最为详尽”，但“有夸诞失实之处，如谓《宣和博古图》之名取诸宣和殿，又谓其成书在大观之初而不在宣和之末”。如《博古图》收入政和癸巳、政和戊戌、宣和五年出土的古器物。^[4]可见《宣和博古图》是经过宣和年间修订或重编。据朱关田先生《印谱起源小识》，《宣和博古图》参照黄伯思《博古图说》，源于宣和殿收藏。

[1]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2] 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43页。

[3] 吴中胜、黄鸣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崇文书局2016年版，第424页。

[4]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第114页。

2. 《宣和画谱》

叙：《宣和印谱》“宣和庚子岁夏至日，宣和殿御制”^[1]，陈传席《宣和画谱考》考证蔡卞^[2]参与编辑，此时宣和殿非宣和年间。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和画谱》本（元大德年间吴文贵刻本）其叙：有“宣和庚子夏至日”，无“宣和殿御制”五字。^[3]此谱不见于南宋诸家著录，吴文贵序“《宣和画谱》乃当时秘录，未尝行世，近好古雅德之士始取以资考证”^[4]。

3. 《宣和书谱》

启功先生对于《宣和书谱》的研究，认为其编订的时间“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戊午”^[5]，跨度尤为大。如果此语不误，说明其发现了《宣和书谱》的一些新证，书谱的修订编辑要提前到宋真宗时。

可见宣和丛书的编辑和形成，其经历过程非常复杂，一般经过初编、修订、重编等过程。

四、宣和印谱的再思考（质疑、辨惑）

对于《宣和印谱》的研究以朱关田、韩天衡、陈振濂诸先生为代表，他们不但解决了历来积累的众多问题（有印谱的创始者、编者；有文献上的，约定俗成的；也有文献之错误等问题）也为宋代印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基础。陈振濂先生对于《宣和印谱》等宋代篆刻史研究，解决了许多文献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如：对于《四库全书提要》与《宣和集古印史》问题）^[6]。

陈振濂先生在《篆刻艺术学通论》第七章第一节《述史》^[7]中，解决了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四库全书提要》对于《宣和印史》的质疑；二是《学古编》罗浮山樵刻本之《宣和印谱》四卷与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之《宣和印史》一卷的时间关系问题；三是提出了《宣和印谱》与黄伯思《博古图说》之间的传递关系问题。

我们在对文献的释读、研究中，又发现了如下问题。

1. 对于《宣和印谱》四卷的记载时间问题

对《宣和印谱》四卷记载，普遍依据吾丘衍《学古编》明代罗浮山樵刻本（1568），认为其出现在明末。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8]卷三十“印章制度”条载有：“《宣和谱》四卷，杨克一《图书谱》一卷又名《集古印格》，王厚之《复斋印谱》，颜叔夏《古印谱》二卷，姜夔《集古印谱》一卷，

[1] 《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2] 陈传席《宣和画谱考》：“元人袁桷《清客居士集》卷四十五‘惠崇小景’条（惠崇作画，荆国王文公屡褒之，京、卞作《宣和画谱》坚黜之）。”注：蔡卞（1048—1117）证明《宣和画谱》开始编制于1119—1125年前。

[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善本丛书·宣和画谱》，1971年印行。

[4]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450页。

[5] 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0页。

[6] 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

[7] 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第188页。

[8]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使用的版本《四部丛刊三编》本，而《四部丛刊三编》本据明成化十年（1474）戴珊据元刻本的覆刻本的影印本。详见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雪玲教授的整理说明。

吾衍《古印文》二卷，赵孟頫《印史》二卷。”这里《宣和谱》四卷，历来被大家所忽视。据戴珊刻本线索，“《宣和谱》四卷”出现的时间下限在明成化十年（1474）。把明代有关“《宣和谱》四卷”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百年。

虽然吾氏的《宣和印谱》四卷与陶氏《宣和谱》四卷有一字之差，但无论是吾丘衍与陶宗仪著录，还是罗浮山樵与戴珊刻本，在两部不同书籍、不同时间、不同人物著述中出现“宣和谱卷数相同”的情况，并非偶然。

2. 对于《宣和印谱》在早期书目中无记载问题

书目记载与否，并非是古籍文献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宣和类印谱的著录，虽然未出现在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与元编的《宋史·艺文志》书目中，但是在蔡绦《铁围山丛谈》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中，一《遂初堂书目》之“谱录类”有“宣和博古图、考古图、李伯时古器图、晏代辨古图、石鼓文考、玉玺记、八宝记、玉玺谱、玉玺议、镜录、鼎录、刀剑录、文房四谱、砚录……”这些记录不但和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相吻合，也与现存宋代古器物谱录相吻合，并真实地反映了宣和殿收藏情况。二《铁围山丛谈》^[1]中，“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至于图录规模，则班班尚在，期流传以不朽云尔。”宣和殿中明确有古印玺类与图录。

3. 对于《宣和印谱》收入的古印章数量问题

《宣和印谱》所收古印不详，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中有“官印千二百有奇，私印四千三百有奇”，“宣和殿有谱”；徐真木《观妙斋集印自序》^[2]中有“余官印五百有奇，藏于盐官许同行先生家”，二者并不矛盾。

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宣和殿藏古器物（含古印玺）有万余；黄伯思《博古图说》收入古印十七品243方；顾氏《集古印谱》所藏官印仅425方。因此《宣和印史》一卷收入官印1200方，虽不知真伪，但从理论上讲能满足宣和四卷印谱之用，又与宣和殿收藏相吻合。因为收入官印或私印5500多方，宋、元、明私人收藏均是难以实现的，唯有宣和殿收藏可以做到。

4. 对于《图书谱》张耒序跋的解读与《宣和殿集古印谱》的提出

（1）《图书谱》

杨克一的《图书谱》（详见陈振濂先生《关于印谱的创始者》^[3]一文），这里不再复述。从张耒序跋内容来看：一符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4]称其为《印格》；二“集印式三十一体”。朱关田先生认为《图书谱》（《印格》）“所谓悉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者，即布列籍录，述其源流

[1] 《全宋笔记》第三编（九），第222页。

[2] 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539页。《观妙斋集印自序》：“爱自《宣和印谱》，世之法物，流于人间，犹得见之。”“余官印五百有奇，藏于盐官许同行先生家。许名令典，万历丁未进士。”

[3] 陈振濂：《关于印谱的创始者》，《西泠艺丛》1983年第8期，第27—28页。

[4] 《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克一，张文潜甥也。文潜尝为之序，其略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补之爱之尤笃。悉录古今印玺之法，谓之《图书谱》。”

正变，已初具学术研究规模”^[1]，见张耒序^[2]。笔者认为：正因为杨克一《图书谱》是“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凡三十有一体，大抵皆其姓名字”，那么它在印谱的基础上，也具有新的内蕴和意义。因此，《图书谱》并非集古印谱类，而是当时的一本篆刻理论集，似乎更为确切、合理。

（2）《宣和殿集古印谱》

既然元代已有宣和谱记载，此恐怕非空穴来风；明清文献曰宣和谱或宣和殿谱或宣和印谱也非偶然；宣和殿收藏大量古印章，且已经开始编辑图录、谱录；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已经编纂《玉玺谱》^[3]，收录历代传国玺的形制图样，并叙述历代国玺的流传过程，已完全具有现代印谱形式。

“宋皇祐（1049—1054）初，始命太常摹历代印书为图”^[4]；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制有《御府宝图》一册”^[5]，证明官家编辑印谱已有先例。《宣和殿博古图》是大观初参照黄伯思《博古图说》^[6]编辑，其中却少了古印章一类。黄伯思大观初曾供职于宣和殿，宣和殿编有收藏图录或者目录图册。综合各方面因素，故提出宣和殿有此类图籍，并把它定为《宣和殿集古印谱》。它是否为现代意义上的印谱，还是只初具规模和形态，尚可研究。因为它是汇集宣和殿收藏的古印章，所以是集古印谱。这不但有黄伯思《博古图说》之佐证，而且有《博古图说》和宣和殿收藏之保证。

5. 乾隆《金薤留珍》之启示

马衡先生《毓庆宫藏汉铜印》序：“印之有谱，盖始于宋徽宗之《宣和印谱》，前此未之闻也。徽宗之于古器物，收罗不遗余力。虽以玺印之微，亦皆著为专书，可见当时学术之盛矣。清之高宗，嗜好与之略同，其所著述亦略同。既著《西清古鉴》等书，以继宣和博古图录，复以藏印千余钮，著《金薤留珍》五集，以继《宣和印谱》，其提倡之功，岂在宋徽宗之下哉。《宣和印谱》虽已不传，而前人之言印者，尚时见征引。《金薤留珍》一书，则仅鈐拓成册，秘藏内府，并《四库》亦未收入，世人几不知有此书。”

序文从宋徽宗、清高宗两位嗜好、著述，给《宣和印谱》的再思考提供了启发。王国维曾对宋大观年间编制的《宣和殿博古图》与清代《西清古鉴》，宋崇宁年间《宣和睿览集》与宣和年间《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作了比较，并提出它们间的传递关系，也值得重视。

6. 小结

《宣和印谱》的再思考，结合宋代金石学，受王国维、马衡先生的启发，进而提出《宣和殿集

[1] 朱关田：《初果集——朱关田论说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268页。

[2] 引用孙向群论文中张文潜《柯山集》内容。张文潜《柯山集》：“甥杨克一梦人授图书，凡三十有一体，大抵皆其姓名字，变易迭出颇奇。惟古人有言梦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梦者，因也。夫因者想之变。其初皆有兆于予心，迁流失本，其远也已甚，故谓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为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无想欤，则无梦矣，岂有有梦而非想者哉！予见尔之好图书几癖矣，心思手画，惟怪之为求，则其梦授于异人何足怪哉！好射者梦良弓，好乐者梦奇声，何则？志固在是也。尔心谓是三十一图皆非平日之所思，则正昔人之所谓因者也。精神迁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谓考古凶，明将来。三十一图曷足怪也哉！尔以是思之，将复有得矣。图书之名，予不知所起。盖古所谓玺，用以为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补之爱之尤笃，能悉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谓之《图书谱》。自秦汉以来变制异状，皆能言其故。为人篆印玺，多传其工，有自远求之者数为予言。予不省之，独爱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务，故并录焉。”

[3] 史正浩：《宋代金石图谱研究》，第68页。

[4] 吴兔床《晋黄康续印式序》、桂馥《续三十五举》。此时印书为图，应该是一种印谱汇集形态，尚未称为“印谱”而已。

[5] 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第208页。

[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古印谱》的存在，更为合理。《宣和殿集古印谱》与杨克一《印格》的出现，是宋代金石学中公私编辑印谱的成果，也是宋代集古印谱与篆刻理论逐渐形成并分道的雏形形态。因此提出观点：宋代第一部官家集古印谱为《宣和殿集古印谱》，第一部私家印谱（及篆刻理论集）是杨克一的《图书谱》（《印格》）。

五、结语

人们心目中的《宣和印谱》（宣和年间敕撰丛书之一）在没有发现具体书籍形态和记载的情况下，尚无法轻易给其定位。好在陈振濂先生的研究已经有了前瞻性的“预流”。在其他宣和类丛书之版本流传与考证等研究成果的佐证下，相当于初版本的《宣和殿集古印谱》可以认定。就目前来看，确定《宣和殿集古印谱》是符合宋代宣和殿收藏之实情的，也符合宣和殿收藏著录、图籍、图录编辑的历史。其意义或为《宣和印谱》提供了基础，虽然后者作为印谱之滥觞具有敕撰的烙印，但《宣和殿集古印谱》显然是宣和殿金石古器物研究的产物，是集古印谱的前期形态，它是篆刻艺术于宋代金石学之产物。因此，对于宋代印学研究或印谱史研究来说，无论是集古印谱类《宣和殿集古印谱》，还是具有学术理论类印谱的《图书谱》（《印格》），皆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陈振濂主编：《中国印谱史图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 韩天衡主编：《中国篆刻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 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
- 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
- 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1998年版。
- 《全宋笔记》第三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 《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 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2008年版。
- 西泠印社编：《“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 韩天衡编著：《中国印学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
- 西泠印社编：《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
- 《初果集——朱关田论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
- 史正浩：《宋代金石图谱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
-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西泠印社编：《西泠艺丛》，1983年第8期。
- 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附录一 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

——1572年，明沈明臣《顾氏集古印谱序》“然古无印谱，谱自宋王厚子顺伯始，王隽子弁氏有《嘯堂集古录》”。

——明沈明臣《顾氏集古印谱序》“然古无印谱，有印谱自宋宣和始，宣和谱今不传，而后王厚子顺伯也谱之已，而王隽子弁氏有《嘯堂集古录》，赵文敏子昂有印史，太末吾衍子行氏有《学古印式编》”。

——1614年《印法参同》“蓄印谱·‘玺考’：宋《宣和谱》（古有印无谱，谱自宋宣和始，谱有四卷，今不传。又有《画谱》，有《博古图》，宋徽宗朝所修书，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阁。其中古玩器、古书画无数，观蔡京保和殿《曲燕记》可知矣。并见《辍耕录》）”。

——1596年，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自序》“耕于石簪山畔者，桐棺裂，获丹筒一函，内蜀锦重封《宣和印史》一卷，凡载官印千二百有奇，私印四千三百有奇，旁皆音释文字”“考印之有谱，自宋宣和殿始，宣和谱不传。而后王顺伯、王子弁、晁（杨）克一、赵文敏、吾子行、杨宗道、钱舜举、吴孟思、沈润卿、郎叔宝、顾汝修各为之谱”。

——《宣和集古印史官印凡例》“孔壁既开，汲冢复睹。自宣和谱印以后，诸名家编次虽繁，然而荆菅瓦砾之下，残阙颇存；赏鉴博洽之流，收摹益富。人握蛇珠，家珍和玉。凡集印：首收藏，次临拓，次宣和谱，泊（洎）集古、学古、印史、印薮诸书”。

——1597年，余经训《范氏集古印谱叙》“宣和散佚，景伯三十载之搜索”。

——1602年，虞淳熙《古今印则跋》“若吾党者，行藉谱以不朽。夫印谱始宣和殿史，其所载官印千二百有奇，私印四千三百有奇。王顺伯、晁（杨）克一、吾子行、钱舜举而后，续之者十一家，然多遗漏。不佞藏可二百枚，未谱也。彦明岂其按昔谱而成今谱者乎”。

——西林释自彦朗若摹《图书府印谱凡例》“本集印章非类一家，搜以远近，盖宣和谱，王子弁嘯堂集，赵松雪印史，吾子行学古编，杨宗道集古印谱，叶景修汉唐篆刻，至于欣赏编亦所不遗”。

——郭宗昌《松谈阁印史序》“嗣是古印即沦落于荒冈断垄间，不过为耕人牧童所得，然亦莫或谱也。谱之者，自宋始，而宣和谱不传，逮王顺伯诸人而下至武陵顾氏《印薮》，始称广博”。

——王在晋《学山堂印谱叙》“古人制作，仪礼周官以外，唯金玉款为可见，而又不多见，宣和印谱，与世俱湮，王子弁之集古，赵孟頫之编史，金玉之章，寥寥仅见焉”。

——吴伟业《学山堂印谱序》“大小篆之来古也，山川碑碣，有峯山新泉诸，而旅彝旅簠，铭识之文，永在昭式，识者重焉。夫史称篆刻，古惟先秦；而政和年间（1111—1118）甚修备，秦人泰山诸碑，丞相斯以大臣通隶书，从祀名山，刻石其上，署曰臣斯篆，非直诵王者功德，兼明丞相书法，何其盛哉。然秦印正刻，其用多反，以文无当，巧为碑，拙为章。而政和二年，内降宣和殿古器图百卷，参伍说文，宣和印谱，遂列六艺。赵孟頫之徒，所以录其事而大复古也”。

——朱继祚《石鼓斋印鼎序》“史游更以章草，魏晋易以行楷，而唐虞三代之文字，不可复见矣。然点画之微，最难辨析，汉家文风丕振，以马伏波之武臣，而辨印章之误，以杨子云之博学，而征油素之奇，故印章唯汉为盛。而印章之有谱，则自宋宣和始。宣和谱今不传，文敏《印史》，

皆可传闻，而不及按索也”。

——周铭《印谱小引》（赖古堂印谱）“汉之君臣，关防奏启，扣以小印。又封之一字，古亦无之，后人创始，古之白记，即封字意也。自宣和以后，印文种种间出，姓字、封记外，无不可始创。然其中参以今古，杂以真贋，淆以雅俗，此道流传几不可问矣”。

——金天昭《立雪斋印谱序》“印之有谱，自宋宣和始。宣和谱今已不传，厥后王子弁有《啸堂集古录》，赵子昂有《印史》，吾子行有《学古编》，叶景修有《汉唐篆刻》，王顺伯、杨宗道、钱舜举、吴孟思各有《集古印谱》”。

——徐贞木《观妙斋集印自序》“原夫篆隶之迹，代有其人。秦汉以来，相传历有真见，非空言也。爰自《宣和印谱》，世之法物，流于人间，犹得见之。（《宣和印谱》，宋徽宗赵佶作，其书长八寸，黄朱为格，泥以麝粉，澄心堂纸。首以秦九字玺，后玉钩‘万岁’二字，乃反文，后‘荆王之玺’，后‘天禄永昌’，后‘中山王宝’，余官印五百有奇，藏于盐官许同行先生家。许名令典，万历丁未进士。）而元王沂、杨宗道、吾竹房、吴孟思师弟子，尽入《印统》（《印统》八本，罗王常作，世宗间人，即罗小华之子。）其法大备”。注：郁重今先生认为“徐贞木叙《宣和印谱》其所载印玺，如秦九字玺，反文‘万岁’‘荆王之玺’等均见于隆庆六年王常辑集之原印铃本与万历三年木刻本，自从王常集上海顾氏藏印原铃本及木刻《印薮》行世以来，仿刻翻本迭出，如来行学之《宣和印史》伪托获原本于桐棺，《四库提要》已辨其伪，故徐贞木所见藏于万历末之许令典本，当是另一托名伪作也。徐贞木似未见王常之原铃本及木刻本而仅见王常距辑前二谱四十二年后所辑之木刻本《印统》”。

——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凡例》“古来印谱以宣和为滥觞，然仅止八卷。其他虽有好古而集成编者，不过五十七卷，各体每多未备，不无阙漏”。

——李果《飞鸿堂印谱序》“其后谱则有《宣和印谱》，陶南村所称杨克一、王厚之、颜叔夏印谱，吾邱衍印文，赵孟頫印史，皆不传”。

——周宣猷《飞鸿堂印谱序》“余尝阅《集古录》所载，如华阳真逸，为王、为颜、为顾况、为陶隐居，讫难确指。是故征信者莫要于谱。印之有谱所以聚金石之散而寿之也”。

——孙彦《飞鸿堂印谱序》“在昔荟萃成书者：若杨克一之图书谱，颜叔夏之古印谱，姜夔之集古印谱，赵孟頫之印史，皆传于世，不无可观，然率止一二卷，即多如宣和印谱，亦仅四卷，终嫌搜罗未广，湮没尚多”。

——倪承宽《飞鸿堂印谱序》“秦相赵竖摹印法已邈，宣和之下零落无言诠。纵有作者寥寥不足纪，岂能汇集大备逾数千”。

——徐曰璫《飞鸿堂印谱跋》“古印有谱，滥觞于宣和，复斋、啸堂继之，近代衍斋朱氏搜辑尤备”。

——朱樟《汉铜印丛序》“印谱滥觞宣和，及顾氏《印薮》一编，可谓详且备矣”。“吾友汪君秀峰，嗜古有奇癖，藏书百橱，工吟咏，得古印几盈万钮，汇为《切庵集古印存》三十二卷，金玉、砗磲、玛瑙、牙、瓷莫不赅备，已较于《宣和印史》”。

——戴廷嬉《退斋印类序》“印章制度，《辍耕录》载之最详，印之谱自宣和始，惜不流传，惟王子弁氏《啸堂集古录》，赵文敏《印史》，吾衍子行《学古编》，杨宗道《集古印谱》，叶景

修《汉唐篆刻》”。

——吴钧《静乐居印娱序》“考印谱之兴，肇于宋而极盛于明”。

——巴慰祖《四香堂摹印自序》“昔之谱者，首推宣和，而王顺伯、赵子昂、吾子行、杨宗道诸家续之。然惟有明昆山顾氏《印藪》搜罗富有，逾于古帙”。

——李宜开《师古堂印谱跋》“其克存古道于一线，靡不归功于宣和王子弁《啸堂集古录》”。

——吴舒帷《含翠轩印存序》“印谱之兴，莫备于宣和，自宋而元，印式、印史、印藪、印范诸名目，几数十家难更仆数；迨其后临摹盛行，不特以伪乱真”。

——吴省兰《含翠轩印存序》“夫印独难于章法耳，凡石刻分行直书，为地宽然有余，印则方圆大小，局于一定，而其文疏密繁简，布置维艰，率尔操刀，每苦无所措手。或拾取古人陈迹，依样为之，攘为己有，何异优孟衣冠，于己之精神面目，究复何与，是安能卓然一家耶，宣和御谱，称大备矣，此外谱录不下数十家，体式各变，然始无陈陈相因者”。

——赵万里《含翠轩印存序》“汉唐以来，私印无人蔑有，世远已不得传，而其规模款识，时或散见于载籍，如《学古篇》《书画史》《七修类稿》《砚北杂志》《云烟过眼录》等书，可考也。宋自宣和谱外，如晁克一、王球、颜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则吾邱衍、赵孟頫，各著有谱录”。

——俞璩《含翠轩印存题词》“孔鼎文残，汤盘铭灭，都付一朝秦火。模糊异宪，增减雷同，漫漶不堪追溯，谁料谱汇宣和，姜赵文何，各成门户”。

——王鸣盛《续古印式序》“夫《学古编》末举古今图印谱式凡七种，今似无一存”。

——吴騫《续古印式序》“汉唐以降，斯道益广，特未有专为一书及图谱以纪之者。宋皇祐初，始命太常摹历代印书为图，宣和中复有印史之集，皆官纂也。其学士家所辑撰，大抵自杨克一之《印格》始，克一字道孚，《郡斋读书志》又作姓晁氏，张文潜甥也。文潜尝为之序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补之爱之尤笃。悉录古今印玺之法，谓之图书谱，自秦以来变制异状，皆能言其故”。

——李亦畴《竹根印谱序》“君言往年得《宣和印谱》原本，简练揣摩，且十余载，《宣和印谱》，集古印之大成，亦犹夫文之八家，诗之初盛也”。

——郎福延《受斋印存序》“查慎行诗云：杨王姜赵，集古谁能穷”。

——季锡畴《铁琴铜剑楼集古印谱序》“集古印成书，始宋之《宣和印史》，晁（杨）氏《印格》。自是王厚之、颜叔夏、姜白石、赵松雪、吾子行咸有著录，然皆不传”。

——姚觐元《汉印偶存序》“印章始于秦，而盛于汉，吉金中无上妙品也，其著录自为一书则始于《宣和印谱》，而杨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复斋印谱》、颜叔夏《古印谱》、姜尧章《集古印谱》继之”。

——吴云《两壘轩印考漫存》“余喜藏先秦两汉以来古铜玺印，前后积至一千余钮，曾仿昔人编辑印谱之例，将官私各印，分类排比，印成十二册，未加考释，但存印文真面目而已，内官印二百余钮，颇有为历代官制所未见者，可以补史志之阙”。

——潘祖荫《齐鲁古印攷序》“高君南郑，余金石友也，以其所辑古印章寄书于余，属为之序，曰：考宋皇祐初，命太常摹历代印书为图，宣和中复有《印史》之作，皆官书也。自杨克一有《印格》，张文潜为之序，其后王子弁、颜叔夏、姜尧章、王厚之、赵子昂、吾邱子行，更仆难

数。然古印流传，大约官印十九，私印十一，私印亦第纪姓名而已”。

——徐庸《二弩精舍印赏序》“昔宋《宣和印谱》久已散佚不传，传者王子弁《啸堂集古录》为最先”。

——董丕《题二弩精舍印赏诗》“纫衿世叔，集古印数百，汇为一编，而问序于予。予以古有印无谱，谱始于宋，而宣和谱不传，厥后王顺伯、王子弁、赵文敏诸家继之”。

——翁之枞《漱芳书屋集古印谱跋》“印谱肇于宣和，及元明有姜、王、吾、赵、文、何各公印书，大都始则古朴，后趋纤巧”。

——孙思敬《漱芳书屋集古印谱自序》“若印谱素以宣和为最，汪氏次之。前明则文氏自成一派，亦足奉为圭臬”。

——王同《师让庵汉铜印存序》“印谱最古者有宋《宣和印史》，然伪书不足征信，惟晁克一《集古印格》一卷见于《郡斋读书志》者，此即集古印文之滥觞”。

——罗振玉《澂秋馆印存序》“古印谱集，昉于天水之世。宣和以降，若杨克一，若王厚之，若颜叔夏，若姜夔，有元若吾邱衍，若赵孟頫，若杨遵，咸有集录，今均不传”。

——马衡《毓庆宫汉铜印序》“印之有谱，盖始于宋徽宗之《宣和印谱》，前此未之闻也。徽宗之于古器物，收罗不遗余力。虽以玺印之微，亦皆著为专书，可见当时学术之盛矣。清之高宗，嗜好与之略同，其所著述亦略同。既著《西清古鉴》等书，以继宣和博古图录，复以藏印千余钮，著《金薤留珍》五集，以继《宣和印谱》，其提倡之功，岂在宋徽宗之下哉。《宣和印谱》虽已不传，而前人之言印者，尚时见征引。《金薤留珍》一书，则仅钤拓成册，秘藏内府，并《四库》亦未收入，世人几不知有此书”。

——黄质《宾虹草堂藏古玺印》之《藏玺例言》“宋元著录，世不习觐”。

——黄宾虹《善斋玺印录序》“集古玺印，与古泉币相类，示信检奸，为世宝贵，视古泉币尤重。王者受命，朝廷分职，裔皇典丽，甚至三代彝器，同尊传国之玺，拜官之印，其显著也。自宋宣和博古图外，别成印谱。后世考藏钟鼎之家，往往不兼玺印，盖以其器物纤细，品制不齐，大逾径寸，小或累黍，官私异制，朱白殊文，钮有熊虎龟蛇之差，质亦金玉铜石之别，弃藏未宏，审释非易。故前人谱录，玺仅言秦，印均宗汉；若其古文奇字，惊世骇俗，又复斥为缪盩，终于废弃，自昔为然，固已多矣”。

附录二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

——陈钜昌（1605年）《古印选》自序“嗣自篆刻通乎法书，栝州神运，既由手裁，《保母》玄文，亲为上石，他如清臣老骨，承旨豪锋，肯寄俗工，定烦名腕，而况颉、籀心声，汉秦神迹，窥班秉翰，代不乏人。然自宣和入谱，始习大成，降是而还，人多异识。至吾淞顾氏，搜奇钩匿，益大厥成，可谓篆学之忠臣，铁书之良史”。

——金光先《复古印选》“夫印章，其来尚矣，自宣和始，而后有王顺伯谱、王子弁《啸堂集古录》、赵子昂《印史》、吾子行《学古印式编》、杨宗道《集古印谱》、叶景修《汉唐篆刻图书韵释》，然皆摹本失真”。

——李维桢《金一甫印谱序》“自宋宣和，王顺伯、赵子昂、杨宗道、吾子行、叶景修、顾汝修诸家谱集，无所不参校”。

——程从龙《秦汉印谱》自序“秦汉篆印之谱，宣和尚矣，迨乎元明，好古之家极意搜集，若杨氏、顾氏皆为名谱”。

——习鸾《澄怀堂印谱序》“考印谱肇于宋之宣和，明文国博寿承，精于篆学，亦有之”。

——朱樟《汉铜印丛序》“印谱滥觞宣和，及顾氏《印薮》一编，可谓详且备矣”。

——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序》“古铜印章始著录于宋徽宗、王顺伯、王子弁，洎乎元明”。

——吴云《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序》“间尝论金石之学明于赵宋，古印之著录亦自宋宣和始，《宣和》谱不传于世，今可而知者，宋有王顺伯、王子弁，元明有赵子昂、吾子行、杨宗道、吴孟思、叶景修、钱舜举、郎仁宝、沈润卿、顾汝修诸谱”。

——袁宝璜《瞻麓斋古印征序》“印谱之作，始于宋宣和，自王顺伯、颜叔夏后，为谱者不下数十家，均可以备著录”。

——吴騫《论印绝句序》“犹之乎印也，在宣和则有谱，克一则有格，嘯堂则有录，顺伯则有图，其他更仆数之而不能尽”。

——倪印元《论印绝句》“一自宣和传印谱，嘯堂集古费雕镂，后来吾赵纷纷继，释韵无如叶景修”（印谱，始自宣和）。

（作者系人保产险公司职员）